《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导读

□ 张太原

无论什么样的领导者，要完成任务或实现目标，都必须解决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在带领党与人民为实现伟大目标的奋斗中，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探索和总结了一整套领导方法。1943年，他为中央起草的一个决定，即《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其中主要论述了两个“结合”和一个“中心”。

首先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主要用来执行政策和完善政策：先在面上铺开，然后再深入到点中，由面及点，再由点带面，循环往复。为指导领导干部具体地运用这一方法，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在领导工作中不要普遍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领导干部要善于“解剖麻雀”，不需要解剖每一只麻雀，解剖一两只就够了，以从个别中找出一般的普遍性的东西。现在，领导同志分头去蹲点，其实，就是这个方法的一种运用，如此做来，使领导者下命令、发指示，能够接地气。在运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注重一般而忽略个别，造成领导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一种是只注重个别而忽略一般，造成领导工作中的经验主义。

其次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作为领导者，要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领导者是群众的学生，说的是制定政策的过程；到群众中去，领导者是群众的先生，说的是贯彻执行的过程。没有群众的领导是“空洞的”，而没有领导的群众，是“盲目的”，是不可持久的。坚持这一方法，就要反对“从机关中来、到机关里去”。毛泽东说：“在机关里面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他还曾说，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是坐在办公室里，是很危险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不仅是领导对群众如何的过程，不仅是让群众被动接受的过程，而且还是群众如何对领导的过程，还是群众怎样产生主动性的过程。为此，毛泽东提出，要了解群众的“心理”和需要，要知道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需要是人一切生命活动的出发点和动力源泉，抓人心，最根本的就是抓人的需要。从满足群众的切身需要出发，去吸引群众，动员群众，是毛泽东倡导的第二个“结合”的具体体现。

“两结合”的方法是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的体现，是他对领导工作的总结与提炼，是他提倡的工作方法的精髓和核心。“两结合”作为一般的普遍的方法论，是有机的统一体。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主要是对“事”来说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主要是对“人”来说的。领导工作说到底就是“以人谋事”。

再次是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这是毛泽东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在他看来，众多矛盾之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繁杂工作之中，必有一个是中心。因此，开展工作首先要抓主要矛盾，抓中心或关键，以带动其他。这首先是一种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也就是说，领导者大脑里应有一根弦，有意识地去寻找它，“任何一级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那么，“中心工作”或“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什么，深思熟虑以后要明确，特别是要告诉下属和自己的团队。给下属明白地具体地指出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就会使之有所遵循。当然，能够“适时”地判定什么是“中心”，需要独具慧眼。善于抓“中心”的另一面就是“多端寡要”，眉毛胡子一把抓，分不清轻重缓急，力求面面俱到，什么事情都想做，结果无一而做好。有些人干工作不可谓不卖力，甚至三更灯火五更鸡，但是干不到点子上，往往会事倍功半，穷于应付，如果学一学毛泽东，或许能够做到一通百通，以四两拨得千斤。

重读经典

为什么要促进领导干部学国学

□ 叶小文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形成的国学，经过今天“经天纬地”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博大、深厚的精神家园。

学国学，可以“穿越时空，与先贤对话，与经典同行”。但沉静下来，不妨问问，为什么要促进领导干部学国学，学怎样的国学？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考察时指出，“展望未来，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在望。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要奋斗，还有领着大家奋斗的责任。

我们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现在离民族复兴越来越近，距离已可以丈量。正因为越来越近，再往前每走一步都是惊险一跳，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巨大飞跃。历史上，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功亏一篑的教训不少。这一阶段，各种问题扑面而来，让人应接不暇，容易顾此失彼。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保持持续、良性增长，整个国家必须持续保持振奋的民族精神和旺盛的创新活力。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一定要有文化根基和价值支撑。

国学，就是一个重要文化根基和价值支撑。

民族复兴必有文化复兴。复兴不是复古，既有“恢复”，更有“创新”。今天我们促进干部学国学，不是把古人编织的画布翻出来，挂在墙上欣赏，而是要织一块崭新的画布，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织一块崭新的画布，就要把握“经”“纬”两个坐标。

坐标“经”：梁漱溟曾讲，历史上与中华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始终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这当中，必有它的道理、它的逻辑。中国古代就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其中很多具有永恒价值，要传承，要弘扬，要在新时代闪烁新光芒。

坐标“纬”：面对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要重新屹立，再图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仅靠藏书楼的经典，传统文化的智慧，行不通。简单回归“克己复礼”的老路不行，另起炉灶走“全盘西化”的邪路危险。怎么办？古今之间有“常”有“变”，中西之间有“同”有“异”。“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要知常知变，知同知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综合中西文化之优长的综合创新之路。

坐标“经”，提示不离不弃；坐标“纬”，促使创造创新。在“经纬”间的“两创”，是“经天纬地”的大手笔，顶天立地的大工程。今日国学，当在其中复位、复兴，成为显学。

我们的干部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要学好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如何契合或兼容？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无论打天下、治天下都通用，但具体阶段的侧重点肯定不同。打天下要走自己的路，治天下更要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通过武装斗争打出了天下，不可能在治国理政、调整内部矛盾时照样不断打下去。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可为今天“资治通鉴”。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可以、也应该成为当政者的修养和为政之道。何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许多智慧，打天下治天下都用得上。

还在战争年代，《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注意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今天“三严三实”的“严以修身”，更是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当代传承。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民本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契相合。

今天，我们党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挑战。面对的最大危险，其实就是贪污腐败的危险。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主体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导致竞争，优胜劣汰，效率大增。市场经济自然要“向钱看”，但也不能搞得“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信仰一概物化，把诚信、道德统统抛弃，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如果物欲横流，社会乱套，市场经济也难以为继。“君子以厚德载物”，岂容“财之日进而德之日损，物之日厚而德之日薄”？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关键是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唤回它、激活它、放大它，使它成为强大的正能量。今天，诊治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道德失范现象，不妨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健体的抗体，增强人们在各种物质诱惑面前的免疫机能，促使人们做到见利思义、义利并举、先义后利。我们这个有着“厚德载物”“重义轻利”传统的民族，有为人类开辟“君子以厚德载市场经济”新境界的“文化自信”。

（本文系作者在2016年8月23日“领导干部学国学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辞，发表时略有改动）

干部国学苑

重视国学的资政意义

□ 张　城

国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具有历久弥新的研究和学习价值。领导干部应从国学中汲取经验与智慧，不断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与水平。

格物穷理。“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格物穷理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从历史深处汲取智慧。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实践，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历史自觉性、历史自信心。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龙去脉，就需要深入了解我国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就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学哲学经典，可明大道、通古今、知人事；学史学经典，可观成败、知兴衰、明是非；学文学经典，可陶冶性情、提升审美境界；学伦理经典，可知荣辱、明廉耻、辨善恶。

知行合一。宋代大儒朱熹曾言：“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这表明：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要坚持知行合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学国学、读经典，不是为读书而读书，更不是读死书、死读书。古人说得好，“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食而不化、学用脱节，生吞活剥、刻舟求剑，违背了学习的初衷。只有坚持知行合一，才能将书本知识化为实践智慧。与此同时，中国向来有上行下效的传统，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领导干部带头学国学，知行合一，表里合一，可以有效推动政治生态的净化。《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干部要“加强道德修养，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党章》中两个先锋队的论述，也与儒家君子德行一脉相承，“关键少数”可谓先锋队中的先锋。“关键少数”带头学国学，以上率下，对于涵养中华民族的文化气韵、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世致用。即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文化战略方针，为汉武帝所采纳。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就是要把积极进取、致用为上的儒家学说确立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正是由于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充分发挥了治国理政、开物成务的实践功能，才不仅成就了它对中国文明发展不断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保证了它不断从社会实践中吸取养分，不断丰富和发展。学国学、读经典，不仅仅是为了自身得益，更是为了伟大的事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应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断阐释，已经初见成效：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等传统强化了社会的公序良俗；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理念，成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价值力量；廉政文化、修身智慧、敬畏精神、慎独意识、民本思想被引入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成为了正党风、转民风、树新风的重要抓手；诚心正意、手握戒尺、心存敬畏、行有所止，变为了党员干部修身的自觉。“修己以安百姓”，经世以致用，永远在路上。

东北工业百年发展的立体呈现

□ 占善钦



东北地区作为曾经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为新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近些年来，东北的经济地位愈趋下滑，其背后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中央文献研究室石建国先生所著《从开埠设厂到“共和国长子”：东北工业百年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一书，为我们解答东北工业兴衰的谜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在全景式的历史脉络中立体呈现。该书将东北工业百年历史划分为九个时期：一是清末民初东北地区的工业发轫，外资势强、官资不足、民资弱小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二是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二元政治经济体制的存在、巨额官僚资本的出现、奉系当局的主导作用；三是日本统治时期，因战争掠夺而导致投资比例严重倾斜、重化工业畸形膨胀、产业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四是国共争夺时期，遭受日本战败、苏联拆运、国共内战等多方面破坏，也开始了现代化大工业生产与管理的尝试；五是东北解放后，形成以重工业为主的国营工业占绝对优势的格局，构成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最早实现了集中统一领导和计划经济；六是“一五”时期，56项苏联援建重点工程落户东北，东北工业基地得以建成，并成为支援全国经济建设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七是“大跃进”时期，钢铁行业单兵突进，引起经济关系各方面紧张，导致严重困难的出现和持续；八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出现了全面恢复和好转，但没有解决生产与生活难以匹配的问题，技术上落后于上海等先进地区；九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了由收到放的不成功探索，呈现出停滞与推进、徘徊与勃兴的逆向交互过程。

在大视野的综合分析中立体呈现。该书在纵向考察东北工业时，还进行了横向考察，主要是注意结合国内外发展大局对东北的影响，注意比较东北和关内地区、国外发达国家的情况，注意联系东北的农业、市场、城市化等方面来综合分析。这样就跳出了立足工业谈工业的局限，可以更为清楚、更为宽泛地了解东北工业的历史进程。这样的研究视野，有助于厘清一些学界尚未具体考证的重大问题。例如，朝鲜战争对东北工业布局的影响。该书分析认为，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使东北从原来最为安全的工业基地，一下子变成了距离战争最近的前方地带，给东北的工业建设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初步改变了东北的工业布局，极大刺激了军工及相关企业的生产，而且战争使党中央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近乎战时的经济管理体制也为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条件。又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东北工业的发展水平。该书指出，虽然东北的石油工业和电子工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取得了很大发展，齐齐哈尔市等局部地区发展较快，但是传统工业行业大多维持原有水平，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始终未能提上议事日程，东北工业运行中的问题与矛盾经过“大跃进”时期的发展、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延续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沉淀与积累，整体颓势到“文化大革命”末期已初显端倪。

在鲜明的问题导向中立体呈现。该书开篇直指全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东北经济的现实困境及对策，并专门梳理了东北工业史的研究现状，针对其中的薄弱环节和模糊地带展开研究。通过扎实论证，该书指出了东北工业发展长期存在的症结：一是工业产业结构中的资源依赖，东北从“机船矿路”到“工业基地”，走了一条以开发区域资源为依托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二是所有制结构中民营经济的弱小，东北地区的民营经济在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没有得到巨大发展；三是政府职能边界的过度扩展，东北经济长期受政府主导，尤其是排除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成为东北发展的桎梏。可以说，现在东北国企的许多问题在东北工业发轫之初就已存在，又历经百余年的积淀和固化，要解决好非常不容易。由此，该书还提出了解决东北经济困境的对策建议。例如：引入市场作用机制，增强企业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转变政府职能；从国家投入、企业税赋等方面出台优惠措施；打破城乡分割和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挥城市的辐射和带动效应，等等。

书海泛舟

好书推荐

书名：《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作者：路风 著

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3月

内容简介：这是一本关于京东方的再创业史，记录了京东方在一个全球高技术工业中的史诗般崛起。通过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团队在真实的世界里创造出来的真实业绩——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20年来，京东方从一家岌岌可危的老牌国企发展成为领军中国工业的龙头企业，并在全球半导体显示工业中异军突起，历经国企改制的脱胎重生和技术替代与市场替代的严酷洗礼，数度破釜沉舟实现颠覆式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爆发出令世人瞩目的创造力。

